

# 台灣威權體制及其轉化的效應

廖 益 興

## 壹、威權轉型的效應：文獻探討

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理論的建構及修正，在在與現實世界的演變有著密切的關係。東亞新興工業國家自六〇年代以來經濟的快速成長，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衰退現象有著強烈的對比效果，從而突顯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在發展研究上的學術價值，以致近來有關東亞發展研究的中外著作陸續出現。但是如同東亞各國經濟表現突出而引起各方學者的研究興趣一般，對東亞國家的研究大都以經濟發展作為研究議題，探討促進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包括國際政經結構、國家機關的角色與職能、內部的社會結構以至傳統的儒家文化等都曾被用來解釋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就。

為此，有關台灣的研究著作大都是以經濟發展為主題，且多數是屬新古典經濟學派及雙元結構學派的作品，其將台灣經濟發展過程化約為人口、資本、技術三者與國民生產的關係(Lee, 1971; Ho, 1978; Galenson, 1979, 1985; Balassa, 1981, 1982; Kuo, 1983; Li, 1988)，說明政府如何依據雙元經濟體制的特質及比較利益之所在，服膺世界市場機制的運作而制定政策促進經濟成長與達成國民所得

的平均分配。由於強調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私人企業以及政府的間接性經濟角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對於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發展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則略而不提，屬於經濟學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純經濟分析研究。

另一類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研究則屬政治經濟學的著作。由於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是依賴發展的顯著個案，因而依賴發展論者往往強調具有發展取向的自主性國家機關，經由積極介入經濟發展事務在經濟發展過程擔任重要的角色，並藉由美援及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重建過程，從戰後初期的「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的發展策略，至六〇年代改採勞力密集「出口導向」(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的發展策略來說明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成果，認為具有發展取向的強有力自主性國家機關〔威權政權〕，其不僅能獨立於社會團體和階級的壓力之外擬定國家的發展目標，並且能夠改變社會團體和階級的行為進而形塑社會的結構，克服依賴的困境或陷阱，促進經濟的發展(Amsden, 1979, 1985; Barrett & Whyte, 1982; Wade & White, 1984; Gold, 1986; Cumings, 1987; Johnson, 1987; Evans & Pang, 1989; Wang, 1993)。但卻甚少觸及國家機關藉由政治力量支配資本累積過程的政治意含。

由於依賴發展理論強調「具發展取向與相對自主性」的國家機關超脫內部社會階級及社會結構的限制，以其制訂的政策促進經濟的發展，但對於國家機關的職能作用和經濟成長的指標間之直接關聯性並無詳盡的說明，而有淪為主觀主義之嫌外；又因只注重「依



賴」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割裂了整體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因而無法觀照「自主」或與「依賴」無關的政府政策，以及與「發展」同時並存或因「依賴」而導致的「落後」與「低度發展」之現象（蕭全政，1989：12）。

因此，用以解釋或說明台灣經濟發展成果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依賴發展理論，雖然指出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部分因素，但是卻無法通盤地檢視和掌握台灣整體經濟現象的成因。由於忽略國家機關介入發展過程的政治社會基礎，以及國家機關之政策作為的政治意含，因而無法解釋一個服膺市場機能運作或具有發展取向的自主性國家機關，為何會制訂出許多阻礙經濟發展的管制措施，並且長期加以維持而不予修正或廢除。此外，不論是新古典經濟論者或依賴發展論者，其對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大都是以總體性的經濟指標來加以比較說明，好似台灣社會整體都雨露均沾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且常以經濟發展成就來解釋台灣政治之所以長期穩定，而甚少探討國民黨政權的社會支持基礎何在。

然而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如同雨後春筍般突破威權壓制的泥土，其聲勢沛然而莫之能禦。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其運動議題含括政治、經濟、社會福利、人權、消費者保護、校園自治以至環境保護，均向既存的威權體制提出抗議與不滿，控訴其壓制、剝削與不公，而要求政治的民主化，國會的全面改選，落實基本人權的保護；要求經濟的自由化，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消弭經濟之特權；要求社會的正義，落實社會福利措施以及對環境之保護等。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以及許宗力等學者，針對一九八〇年代之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的統計分析，一九八五年全年的自力救濟事件僅有29件，一九八六年增至75件，自民主進步黨九月二十八日成立後的十至十二月期間就有34件，超過一九八五年全年的總數，而一九八七年共發生有173件，一九八八年有189件。據此，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呈現急速增加之趨勢（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等，1992），使得原先的「大有為」政府變成眾矢之的而為抗議群眾眼中「顛覆無能」的政府。

根據學者對台灣解嚴之後社會運動興起原因所作的研究，其採取傳統的結構功能論者認為，台灣社會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而社會日趨多元化，導致社會自主力量的出現衝擊既存威權體制而產生社會運動（林嘉誠，1992；蕭新煌，1989a、1989b；高承恕，1989）；然而其採資源動員理論者則認為，由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國民黨威權統治出現危機，對政治反對運動喪失鎮壓的能力而開始戒嚴體制崩解後的政治轉化，由於轉化過程之政治局內人對於政治機會的需要與創造而對社會受斥團體進行資源動員所致的（張茂桂，1989：42）。

雖然上述兩者對解嚴後社會運動風潮起因的觀察角度和說明有所不同，但均認為長期以來積存於當前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種種相對不公平、不正義是社會運動產生的主要背景結構因素。為此，社會運動大多屬於社會既存弱勢團體的抗議活動，如勞工、農民、婦女、原住民、消費者等運動，顯現出既存威權體制對社會弱勢



團體的壓制與剝削之情形。

據此，許多國內外學者眼中主導台灣經濟發展達成所謂的「成長與公平攜手並進」(growth with equity)經濟成就，而有「台灣奇蹟」(Taiwan Miracle)之稱的「大有為」政府(龐建國，1988：37-51)，業已成為弱勢團體社會運動中的抗議對象，抗議群眾控訴國民黨所控制之國家機關，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上諸種政策的不公平、不正義。在台灣社會的絢麗經濟成長數據表面之下，亦有其黑暗的一面，種種經濟發展的果實並非每個社會成員都可與嗜，而是以某些團體或個人之權益作為經濟發展的犧牲代價。暴露出經濟發展論與依賴發展論兩者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所作解釋的侷限性，因為上述兩者均忽略國家機關諸種政策作為之政治性目的在經濟決策過程的重要影響力。

但是，不論結構功能論者指出既存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不公平，用以說明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之所在，或資源動員理論從團體動員能力的變化，以及政治局內人和社會弱勢團體間互動過程的策略運用，來解釋解嚴後大量出現的社會運動，在在都涉及國民黨威權體制之本質，並在時空推移的歷史過程中其內部結構矛盾的具體顯現。然而很可惜，大部分的相關研究並沒有就「歷史——結構」的分析角度來深刻觸及台灣地區威權體制在歷史過程，中共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利益中介機制及社會支配體制之內容和彼此之間的功能聯結關係，以致無法整體性地掌握或解釋台灣當前的政治、經濟及社會之現象。

例如無法說明，何以在國民黨威權體制具有如此的壓制性與剝



削性的情形下，執政的國民黨政權在從戒嚴時期至目前為止的歷次選舉總是能獲得多數的選票與席位，其中一九九二年第二屆立法委員的全面改選，國民受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敗，但即使如此仍掌握有半數以上的選票，並贏得三分之二的席位。

此外，社會反賄選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輿論一片譴責金權政治的惡質化現象，國民黨層峰也誓言支持並舉辦一個乾淨的選舉，但是財團及地方派系依舊是國民黨提名小組的最愛，選民們依然用選票將他們送進國會。

因此，在台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圖象上充滿著諸種矛盾現象，似乎在此一色彩的大拼盤上，各家的理論、立場及觀點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它所屬意的事實現象，用以證成其所主張理論及觀點，但在這同時也遭到對立或不同理論和事實現象的否證。

爲此，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爲：台灣地區威權政經體制爲何能在經濟面上充斥著自由經濟學家視爲有礙經濟發展的種種經濟管制及獨佔或寡佔部門的情形下，仍有顯著的經濟發展？在政治面上政治反對人士和社會運動人士眼中的「不公不義」、「殘害人權」的政權，何以能在到目前為止的歷次選舉獲取絕對多數的選票與席位？這兩個政經面向上的矛盾現象之間有何關聯存在？亦即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所形成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利益中介機制以及社會支配體制之間的功能聯結關係與上述矛盾現象有何因果關係存在？

另外，自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以來，歷經諸種政治遊戲規則的修定以及老代表的退職，逐漸建立以政治參與和選舉競爭爲主要特



質的民主代議制度。然而在民主代議制度政治權力來自選票的原則下，具有掌握與汲取選票能力的地方派系、財團積極介入選舉向國會進軍，挾民意以強化其權力的基礎與正當性，侵蝕並挑戰執政黨中央及行政部門的支配地位，在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擁有更多的發言權與影響力，甚至跳脫黨中央的節制組成各次級團體合縱連橫，為特殊的利益護航或通過與行政部門相對立的政策方案。似乎威權政經體制的轉化反而提供方便地方派系、財團擴張其政經版圖的有利環境條件。

而國內近年來民代特權關說、政商勾結與利益輸送的弊案頻傳，其中牽涉金額動輒數億以至十數億，再則財團變更地目炒作土地坐收暴利以致房價飆漲居高不下，薪水階級的購屋者為繳納長期的房屋貸款而淪為「屋奴階級」，而無力購買者則淪為「無殼蝸牛」，似乎伴隨民主代議制度而來，是金權政治的盛行與社會財富分配的扭曲。為此，社會瀰漫著一股「反商」的情緒。威權體制轉化所衍生的效應似乎是金權政治的深化，而與社會普遍的期望相違背。

對於上述現象社會輿論大多從道德性的立場或規範性的觀點加以批判，但Lowenthal認為威權體制的轉化及其結果深受歷史環境因素的塑造和決定，這些因素包括先前民主體制的崩潰方式、威權體制的特質威權統治時間的長短、威權政權所憑藉的統治工具及方法、威權體制轉化的啟始及時序、統治精英對威權體制轉化的安全感與自信心、政治反對精英推動威權體制轉化的能力與信心、社會經濟環境及國際政治情勢等(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x)。而Przeworski亦指出民主政治的建立過程是讓所有利益處於不確定狀



態的制度化過程，各方權力競逐的結果是開放的。威權體制要順利進行民主化，首要解決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將利益的不確定狀態加以制度化，但又不威脅到那些依舊有能力逆轉整個過程的個人或團體的既得利益(Przeworski, 1986: 60)。

據此，雖然內外政經環境變遷所衍生的龐大壓力使威權體制面臨嚴重的挑戰，醞積了促使威權體制轉化的動力，但是原先威權體制的特質、統治的方式、統治時期的長短、轉化的形式及統治精英的利害考量等因素，對威權體制的轉化及其結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本文擬就台灣威權體制的特質及威權體制轉型階段政經權力結構的重組來審視上述威權體制轉化所產生的效應。

## 貳、台灣威權體制的特質

國民黨藉由長時期威權統治而對龐大社會政經資源的支配掌握，取得對威權體制轉化過程的主導權，並憑藉在威權統治時期有限選舉中所發展出的選舉動員規劃能力，以及一套適合其體質的選舉策略和選舉制度設計，使得國民黨統治精英相信在撤除戒嚴體制對其執政地位的絕對保障後，依然可以經由選舉競爭的獲勝而繼續保有政權（朱雲漢，1992a: 6）。因而認為政治民主化不僅不會對其既得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並且得以化解當前政權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遂在面對各方的壓力之下採取主動妥協的形式，並在主導整個威權體制轉化過程中作維護其既得利益的安排（吳乃德，1989; Liu, 1991）。

因此，有相當舊有威權體制的特質被保留下來，遂有人認為這



僅是由否定人民委任統治和禁止反對黨成立的「硬性」威權體制，轉而承認人民主權及反對黨的存在，但先前威權統治者依然可藉由龐大社會政經資源的掌控而總是能在選舉競爭獲勝的「軟性」威權體制（Winckler, 1992: 224）。舊有威權體制的諸種機制依然保持運作。

雖然威權體制是以國家公權力〔獨佔性強制武力〕為基礎，由少數統治精英所掌握的國家機關自上而下地對民間社會進行支配與控制，從而在政治上顯現出對人民基本自由權利與政治參與的限制，在經濟上是對經濟活動與市場行為的管制操縱，在社會上則是對社會團體與社會運動的動員和壓制，在文化上則強調意識型態的灌輸與媒體的操控（蕭全政，1990）。

但是除採取高壓的恐怖統治策略迫使人民屈從之外，威權統治精英亦可藉由公共政策的實踐，如土地改革以及經濟發展等，達成社會財富的重分配與生活水準的提升以換取人民有條件式的順服(conditional compliance)。此外，威權政權在歷經以高壓恐怖統治策略以清除反對力量，並透過公共政策的實踐以換取人民有條件的消極服從之後，則可轉而藉由利益中介機制強化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支持而擴張政權的社會基礎（Wu, 1987: 16-18）。

因此，就威權體制的統治精英而言，一方面基於鞏固政權本身的需要，而與其他民主國家一樣需藉由一套利益中介機制(Interest Intermediation)來擴張政權的社會支持基礎；另一方面則需同時將自己獨立於社會集體壓力之外，並壓制政治反對勢力的政治動員空間與機會來保有執政地位。



基於威權體制特質而衍生的上述需求，由於多元主義(Pluralism)與社會統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式的利益中介機制強調相對於國家機關的民間社會之自主性，使得統治精英難以獨立於社會集體式的壓力之外，與威權體制的需求不相容而不被採行。

因而威權統治精英通常藉由以政治有限多元主義(Limited Pluralism)為基礎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式的制度安排，在民間社會建立一個由國家機關許可之少數團體所組成的功能性層級利益中介機制，並由國家機關指派該團體的領導人在既定的規範限制下與國家機關進行互動，企圖阻止自發性社會利益聯結的形成，藉以避免階級力量的凝聚、串連，而利於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的支配及控制(Malloy, 1977: 4)。

此外，威權統治精英雖然藉由國家統合主義的安排，壓制社會自主團體的產生以及階級力量的凝聚串連，但對既存的社會團體及結構並不進行全面性的滲透與改造，而是另外以特殊取向之私人利益交換的依恃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利益中介機制，透過個別攏絡的手段組成公開或半公開的寡頭統治聯盟，而藉以護衛統治聯盟個別成員的利益，並凝聚統治聯盟成員之間的向心力(Macridis, 1986: 216)。

據此，威權統治者藉由國家統合主義「先佔」的制度安排，阻止或延遲自發性之社會團體與階級組織的形成，避免或減緩社會集體壓力的產生，並透過依恃關係網絡以恩惠個別給予的方式，將社會團體的集體需求轉化為成員的個別需求，降低因社會團體集體行動所導致體制或政策遽烈轉變的可能。從而弱化民間社會對國家機



關集體提出有效需求的能力及意願，並使國家機關得以交換政治追隨者的支持擴張政權的社會基礎，且獨立於社會的集體壓力之外。

於是，國民黨政權透過國家統合主義式的制度安排，來監控社會團體及組織，並壓制或弱化階級性社會組織的利益代表功能，將職業團體之組織，如公會、工會、漁會、農會等職業團體，轉為半官方的官僚機構扮演宣達政令、執行政策與監控團體成員的角色。另外，則透過威權體制恩惠系統的個別恩惠給予方式，將集體需求轉為個別成員的需求，來避免集體行動的產生並交換政權追隨者的政治支持。如在地方派系不挑戰威權統治當局的政治主宰性與合法性的前提下，得以透過威權體制內的恩惠系統壟斷地方性政經特權，並藉此建立或鞏固與選民之間的依恃關係，換取選票贏得選戰取得政治職位，而威權統治當局則藉由嚴密控制的龐大政經資源來換取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不僅在戰後初期強化國民黨外來政權與本土地方精英的聯結，克服與本土社會的隔閡情形，有效地紓緩本土政治精英要求政治參與的壓力，並在七〇年代本土反對運動逐漸興起後有效地壓縮其動員空間，而有助於維持國民黨政權的穩定（Chu, 1992: 27）。

為此，國民黨政府藉由公權力的掌握持續地擴張國家機關的角色，創造政策性的獨佔或寡佔部門用以增加國家機關及其黨組織所支配的政經資源，作為威權體制恩惠系統的恩惠來源，透過依恃關係網絡所建立的恩惠系統進行私人利益與政治支持的交換。因而社會主要的組織、利益團體均視國家機關為政經特權的最終來源，而以國家機關作為滲透的對象而相互競租。然而相對上述團體組織必

需放棄其影響或主導政治過程的意願或權力，而在寡頭統治聯盟中居於從屬地位，藉以交換威權統治者所特許的賺錢機會，取得市場上的優勢交易地位分享經濟租金。因而威權體制的有限選舉與議會政治僅是聊備一格不涉及實際的統治過程，作為寡頭統治聯盟護衛既得利益的工具而已。

此外，國家機關以政治力支配並加速資本的累積過程，壓制自主性社會團體、階級組織以及政治反對團體的形成，並配合六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重分工過程，以廉價的勞動力及政治穩定吸引外資的進駐扮演美日核心國家的海外加工出口基地，藉由勞力密集產業出口的快速擴張來維持作為統治聯盟政治性租金來源的國內獨佔或寡佔部門的運作。

因此，除了以正式行政與立法的方式建立國家機關對勞工及工會形式上的「合法」統制外，並透過非正式的黨各級組織的嚴密運作，對工會組織直接的掌控獨佔工會組織的領導權，從而落實國家統合主義式的工會支配體制，並在與資方管理權合作下，由「黨、政、資」組成防堵自主性工會出現的緊羅密網。

因此，自五〇、六〇年代以來國民黨的勞工政策，即是以勞工從屬於國家、勞資合作、黨的一元化領導為主軸，將「勞資合作」作為黨縱向領導的統合象徵，完全漠視資方對勞方的剝削現實，只是企圖全面地控制勞工使之成為黨一元化領導的政治資源（李永熾，1992：240），而將勞工等大眾排除於政治過程之外，由其擔負資本累積過程所產生的成本與代價。

加以幾近乎所有的政經資源都在威權統治者的選擇性給予之下



，成爲威權體制恩惠系統的恩惠來源。並因這種特殊關係取向的恩惠給與方式並不及於一般個人或團體，而只及於與國家機關有密切關係的個人或團體，是特殊利益與政治支持之間的交換（王振寰，1992），使得台灣社會之普遍性政治權、經濟權與社會權的理想無法落實，而成爲社會運動產生的背景結構因素。

因此，在威權體制之下對個人或團體而言，其主要目標自是希望受到威權統治當局的恩寵而成爲寡頭統治聯盟的一員，分享恩惠資源，而非民主體制的建立、社會經濟福祉的提升以及社會正義的實踐等普遍性理想的實現，使得政治寡頭統治聯盟與經濟剝削集團的成員間有相當高的重疊性。國民黨統治聯盟成員中之黨、政、軍、財團、地方派系等，各自擁有以政治力所創造出所屬的「獨佔或寡佔經濟租界區」，依序爲黨營事業體、公營事業體、退輔會事業體、大型民營事業體以及區域性獨佔事業體，使威權體制恩惠系統充滿政經利益交換與相互奧援的情形，而成爲政經利益的分贓系統。也使得官商勾結、民代關說、利益輸送等現象層出不窮而爲威權體制的常態現象。

基於以上的討論，吾人可瞭解國民黨所掌握的國家機關居於特定歷史結構之位置，藉由高度國家自主性的取得，從而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不斷採取因應政經結構變遷所衍生之內外需要，且相符應於威權體制之權力系統特質的合理化措施，進行政經資源的累積與汲取以維持政權的存續發展。建立由戒嚴體制與有限選舉制度相混合的政治體制；獨佔性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與依賴美日之出口導向經濟相混合的二元化經濟體制；以及由恩庇侍從關係式之利益中介機

制與國家統合主義式之社會支配制度相混合的社會動員控制體制等所聯結而成的台灣地區威權體制。

在國家機關的公權力為基礎，藉由限制競爭塑造政策性的獨佔或寡佔部門以創造或增加政治分配性的經濟租金，作為依恃關係利益中介機制的物質基礎建立起與本土地方派系侍從關係，並在大選舉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有利於地方派系運作和發揮該黨組織選舉規劃配票機能的制度之下，透過黨組織的選舉規劃，藉由地方派系長期掌握獨佔性地方政經資源所累積的社會關係網絡和龐大財力，建立組織嚴密運作良好的選票動員及買票機制，進行選票的蒐集累積。

此外，並經由在公部門所建立的侍從關係，將國家機關所汲取的資源以膨脹人事費用、社會福利資源分配及特殊優惠待遇等方式，藉以交換公部門成員的政治支持，再透過分隸各公部門機關組織之特種黨部進行選舉動員，使得國民黨得以累積多數選票與席位，用以合法化其對台灣的威權統治之行徑，並保有其統治地位。

台灣威權體制如此的功能聯結關係，使得台灣在經濟上雖充斥著作為威權體制恩惠系統物質來源的龐大獨佔或寡佔部門，但在國家統合主義工會支配體制下，得以低廉工資及政治穩定快速擴張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帶動台灣經濟的成長，而仍得以有顯著的經濟發展。但如此的二元化經濟體制深具壟斷與剝削色彩，是以農工、消費大眾的經濟福利為犧牲代價的，使得台灣社會充滿著不義、不公的情事，而為社會運動發生的背景結構因素。然而威權統治者卻藉由上述獨佔或寡佔部門作為恩惠來源的依恃關係利益中介機制，



透過個別恩惠給予的方式交換受惠者的政治支持，累積多數的選票與席次，用以合法化其威權統治之行徑。

### 參、威權轉型時期統治聯盟權力結構的重組

但在解嚴之後由於民主政治遊戲規則的建立，政權是隨政黨選舉競爭的勝敗而轉移，選票成為權力的基礎與來源，掌握了選票也就掌握了權力。因而人脈、金脈豐厚的地方派系與財團，在現制以突顯候選人個人特質為主的大選區單記不可讓渡選舉投票制度下，強化他們對選舉的結果有相當的影響力，加深國民黨政權對地方派系與財團的依賴。

此外，隨著民主化過程立法部門權力意識的逐漸高漲，加以在金融、貿易、產業政策上一連串的經濟自由化措施的開放過程，意味著龐大經濟利益的重分配，使各方勢力都企圖利用權力日益增強的立院作為影響政府決策的管道，立法院遂成為各方勢力主動競逐或護衛經濟利益分配的主要場域，各次級團體紛紛成立追求特殊政經利益，不再順服黨中央及行政部門的節制與支配

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下重組了威權體制的政經權力結構，不僅改變了原先中央宰制地方、行政支配立法的權力生態，並且改變國民黨寡頭統治聯盟成員在權力結構上的位置。在伴隨政府經濟自由化措施與高度入場限制（如新設銀行的新台幣一百億最低資本額限制）的既開放又管制政策，形成有利於財團結盟擴張的情境。加

以立院次級團體林立合縱連橫侵蝕黨中央與行政部門領導地位爭取立法主導權，逐漸形成具有自主性的權力集團。為民代、地方派系與財團的結合開一新紀元。

根據學者的統計，國民黨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所提名的候選人具有地方派系或財團背景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吳文程等，1993：41），顯露出由國民黨統治精英、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相結合的保守聯盟雛形。

因此，在解嚴之後的威權體制轉化階段，政治的民主化在既有的選舉制度與政治生態下，卻是提升地方派系與財團在選舉競爭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強化上述兩者在國民黨統治聯盟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擁有比過去更大的發言權。使得政商交往日益密切，利益團體間相互競租的現象更加熾烈，中央政治的金權色彩更形濃厚。經濟的自由化在續存的中央集權管制心態與利益團體追求分配性經濟利益的情形下，反而有利於財團和國民黨黨營事業在國內獨佔或寡佔部門的擴張，使得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更形惡化。在社會正義的實現上，諸多社會問題並不因威權體制的轉化而有顯著的改善，具有社會財富重分配功能的租稅與社會福利制度依然付諸闕如，雖然在社會福利、勞工、農業、環保政策上略有調整，但整體而言依舊是重軍公教輕社會弱勢團體、重資本家而輕勞工、重工業而輕農業、重生產而輕環保，並沒有作結構性的調整。



## 肆、結 論

即使在解嚴之後一個全面選舉競爭制度的得以形成，但是距離建立一個能夠體現國民主權與社會整體利益之新政經體制的理想，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特別是在威權體制轉型階段，中央與地方、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也隨著改變。在民主代議制度要求政治權力來自選民同意的情形下，立法部門已逐漸成為政經資源的主要分配場所，擁有累積選票能力的地方派系和財團遂成為該分配場所的主要勢力。使得國民黨政權的本質由原先外省統治精英主導與本土政客從屬之二元化政治聯盟，轉變為一個在社會經濟問題上相當保守的國家行政領導精英、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三者的結合體。為了因應民主化所帶來更具競爭性的政治環境及保有統治地位，國民黨統治精英似乎更加依賴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的合作（朱雲漢，1992b）。

因此，在民主代議體制下社會整體利益的匯集以及意志表達，必需透過適當的選舉制度設計，否則在現行的選舉制度具有促進金權政治的特質，上述金權政治的惡質化現象難以道德性的訴求及批判來遏止或改善。所以除制定系列的陽光法律外，必需對現行所採的大選區單記非讓渡選舉制度加以改革，在選舉制度設計上應使政黨在整個選舉過程扮演主要角色，並提高候選人當選所需選票的比例，而強化政黨對其所屬黨籍民意代表的紀律要求能力，建立以政黨為對象的選舉公費補助制度，以降低候選人個人因素和金錢對選

舉結果的影響力，抑制地方派系和財團的選舉影響力量，藉以改善賄選與暴力橫行的惡質選風消除金權政治的陰影（謝復生，1992: 22）。

基於上述討論，強調政黨角色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和提高候選人當選的選票比例之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度，應是未來選舉制度改革的參考，應朝擴大政黨名單代表的名額及兩票制方向前進。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份

1. 王振寰，1992「私人資本與台灣的政治轉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中國社會學社合辦，「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三月七、八日。
2. 朱雲漢，1992a「現階段國民黨之組織體質與權力生態」，中國時報主辦「超越與重建：迎接中華民國新時代研討會」，七月七日至九日。
3. 朱雲漢，1992b「台灣政權轉型期政商關係的再結盟」，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頁58-78。
4. 李永熾，1992「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台灣工會組織」，澄社編，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台北：自立晚報，頁235-252。
5. 吳乃德，1989「不確定的民主未來：解釋台灣政治自由化現象」，中國時報主辦「中國民主前途」研討會論文，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6. 吳文程等，1993「第二屆立委選舉觀察」，國會觀察基金會主辦「第二屆立委選舉觀察報告發表會」，二月十四日。
7. 林嘉誠，1992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8. 高承恕，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頁9-19。
9. 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等，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10. 張茂桂，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國家政策資料研究中心。
11. 蕭全政，1989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家政策資料研究中心。
12. 蕭新煌，1989a社會力——台灣向前看。台北：自立晚報。
- 1989b「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頁21-46。
13. 龐建國，1988「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兼論中華民國台灣的經驗」。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創刊號（十月）：37-51。
14. 謝復生，1992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二、英文部份

Amsden, Alice H.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3 (July): 341-380.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78-106.

Balassa, Bela.

1981.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Pergamon.

198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 Econom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rrett, Richard E. and Martin K. Whyte.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 Deviant Cas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 (March): 1064-89.

Chu, Yun-han.

1992.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Cumings, Bruce.

1987.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 Deyo, Frederic 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44-83.

Evans, Peter B. and Pang, Chien-Kuo.

1989. "State Structure and Stat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Taiwanese Case for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ed. Hsiao Hsin-Huang, Cheng Wei-Yuan and Chan Hou-She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3-30.

Galenson, Walter, ed.

1979.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Asian Countr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Press.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Sharpe.
- Ho, Samuel P.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8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 Deyo, Frederic 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36-64.
- Kuo, Wan-Yong.  
1983. *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oulder: Westview.
- Lee, Teng-Hui.  
1971. *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 K.T.  
1988.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Behind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u, Yih-jiun.  
1991. "The Election-Drive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Macridis, Roy C.  
1986. *Modern Political Regimes: Patterns and Institutions*. Canada: Little, Brown & Company.
- Malloy, James M. ed,  
1977.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n*.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A. and Schmitter, Philippe.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47-63.

Wade, Robert. and White, Gordon., ed.

1984.*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Brighton & Engl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ang, Hao.

1993."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State in Postwar Japan and Taiwan," *Issues & Studies* (June) 1993: 80-96.

Winckler, Edwin A.

1992."Taiwan Transition ? ." in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ed.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p.221-259.

Wu, Nai-Teh.

1987."The Political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